

李鴻章與清季中國外交

蔡東杰◎著



文史哲大系 159
蔡東杰著

李鴻章與清季中國外交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李鴻章與清季中國外交 / 蔡東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2001[民90]
面 ;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159)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644-X(平裝)

1. 中國 - 外交關係 - 清(1644-1912)

641.7

90004817

文 史 哲 大 系 ⑮

李鴻章與清季中國外交

著 作 者 : 蔡 東 杰
發 行 者 : 邱 家 敬
出 版 者 :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 臺北市106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E-mail : twenchin@ms16.hinet.net
電 話 : (02)23636464 傳真 : (02)23635439
郵政劃撥 : 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820號

初版 : 2001年4月一刷
ISBN : 957-668-644-X

印數 : 1000本
新台幣 180元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緣起	1
一、以人物為研究中心的概念	1
二、歷史的不確定性	3
三、價值中立與分析判斷	5
第二節 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若干考察	6
一、近代化觀念導引	7
二、所謂大變局的產生	10
三、回應與挑戰	12
第三節 關於研究李鴻章的幾個問題	14
一、富爭議性的歷史地位	14
二、幾個基本研究取向	17
第二章 奠基：清季軍事結構的變遷	20
第一節 清季兵制改革與滿漢勢力消長	21
一、清朝前期的控制模式	21
二、同治中葉以後的權力轉化	25
第二節 湘淮軍之替代及其意義	28
一、湘軍之形成與影響	28

二、李鴻章的崛起與淮軍初期發展	32
第三節 地位鞏固與對外概念的形	37
一、軍事進展中的權位轉移	38
二、對外接觸的初期階段	41
第三章 環境：清季官僚體系的特色	46
第一節 中央集權結構下的羈縻性控制	46
一、集體於皇帝的政治現實	46
二、外放官員與京內的連繫	49
第二節 地方權力的上昇及其影響	52
一、清代督撫制度之建構	53
二、咸同以後督撫權力之演化	56
第三節 外交機構的設置與其意涵	61
一、無機構時期的對外交涉	61
二、總理衙門的設置	64
三、人物中心外交與機構中心外交	68
第四章 登場：從中日締約到國防辯論	71
第一節 清季中日關係的變化	71
一、李鴻章初期對日態度	71
二、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國際觀	73
三、中日修好修約的簽訂	77

第二節	台灣事件與琉球問題	81
一、	日軍征台及琉球歸屬問題	81
二、	何如璋主張及李鴻章之因應	86
第三節	海防與塞防的辯論	90
一、	新疆問題及爭議之起	90
二、	其他意見及後續發展	93
第五章	轉折：越南事件中的和戰掙扎	98
第一節	問題之源起與開始談判	98
一、	清季國防政策的轉變	98
二、	法國在越南的利益開展	101
三、	光緒朝前期的中法交涉	103
第二節	由和平談判轉向戰爭	106
一、	交涉初期和戰爭議的形成	106
二、	法侵北圻及李寶協議	110
三、	中法正式宣戰前後之李氏態度	113
第三節	協議達成與戰爭結束	116
一、	清流派態度與中國的宣戰	116
二、	戰爭持續中的各國調停	120
三、	清廷乘勝即收的心理及和約簽訂	122
第六章	下坡：朝鮮戰爭與個人威望受挫	127

第一節	十九世紀末葉中日互動之背景	127
一、	清廷基本之朝鮮政策	127
二、	日本西進與征韓論之起	130
三、	李鴻章的態度與江華條約訂立	132
第二節	東北亞三角關係之開展	135
一、	朝鮮之門戶開放政策	135
二、	從壬午軍亂到甲申政變	139
三、	東學黨之亂前十年的朝鮮局勢	143
第三節	中日戰爭爆發	145
一、	衝突發生的因素分析	145
二、	戰事之起及初期發展	149
三、	中外對戰爭所持態度	152
第四節	和議的進行及其最後解決	156
一、	戰爭的持續與失利	156
二、	清廷決策過程中的輿論力量	158
三、	馬關議和與條約簽訂	161
第七章	終站：從中俄密約到辛丑和約	166
第一節	以夷制夷策略的再發揮	166
一、	馬關議約的後續發展	166
二、	中俄締約與周遊諸國	170
第二節	最後的議和活動	175
一、	中俄密約的歷史影響	175

二、排外浪潮與義和團事件·····	177
三、辛丑和約的談判過程·····	180
第八章 結論·····	183
第一節 一個近代外交史的縮影·····	184
一、十九世紀末的中國與世界·····	184
二、中國的社會結構及其官僚·····	186
三、李鴻章與近代外交·····	188
第二節 務實性的外交策略·····	190
一、守勢戰略與和戰抉擇·····	191
二、外交技巧及其手腕·····	194
參考書目·····	19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緣起

一、以人物為研究中心的概念

英國的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其所著《英雄，英雄崇拜，與英雄史觀》（*On Heroes, Hero 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一書中，開宗明義便說道：

……宇宙歷史……基本上是那些曾在世界工作的偉人的歷史。他們是人類的領袖。這些偉大的人物，他們是一般人期期欲作或欲獲得之一切的雕塑者與模範，從更廣泛的意義言之，他們乃是創造者。我們所見到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主要是這些被派遣到這兒來的偉人們之思想的外在而有形的結果，以及實際而具體的表現。¹

這種論點乃是對以「人物」為中心之歷史研究法的有力支持。這派學者認為，世界的歷史儘管是由全體人類所共同推動的，但某些特定人物（specialized person）的貢獻不僅不應予以磨滅，甚至更必須加以突出，以使其成為某一時期的象徵代表。當然，此種觀點絕非是一

¹ Thomas Carlyle, *On Heroes, Hero 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London: Ward Lock & Bowden, 1896), p.1.

種可在歷史學界取得共識的概念；例如像卡勒爾（Erich Gabriel Von Kahler）博士雖也說過「歷史是以人為出發點的」；但此處所指的「人」並非是「個人」，而是「集體人」，因此他又進一步申論說：

……據此，則歷史應是從超個人（supra-individual），或更適當的說，超私人（supra-private）的層次來開始的；也就是建立在集體、制度、民族之水平上的。當我們就其完整的意識來擇取歷史這個名詞時，……我們心目中所意指乃是人類的歷史。²

簡言之，卡氏在體察歷史演進時所採取的乃是種宏觀的角度，亦即由人類行為的共同脈絡去尋求去歷史的一體性，而非採取片面態度切入歷史高潮點，在進行抽離後突顯其時代的特徵。於是，在此一邏輯的推衍下，便摒除了傳記式的研究方法。正如柯林烏（Robin G. Collingwood）也曾提到過的：

……譬如傳記，無論它包含了多少歷史的成份，它賴以建構之原則不僅是非歷史，而且是反歷史的。推其究極而論，只是一堆生物事件，一個人這個有機體的出生與死亡；因此它的架構不是思想的架構而是自然過程的架構。³

這種說法對於以「人物」為中心的研究法，可說是很嚴厲的批評了。不過，由上述的討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一種正反俱呈的思考模式來：的確，歷史上的許多偉大成就或重大變革，都不可能是單由個人，而必然是由某個特定地域中的全體人們去共同推動並達成的，例如光是有秦始皇一人，而沒有秦軍將士，也絕不可能完成統一中國的

² Erich Gabriel Von Kahler 著，黃超泯譯，《歷史的意義》（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67 年初版），頁 7。

³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304.

霸業；所以整個來說，歷史確實具有其「普遍性及不可分割性」。正如布洛克（Marc Bloch）所言：

……在地理景觀背後，在工具器械背後，以及在看來幾乎已完全背離其創建者的制度背後，就是人本身。而歷史研究想掌握的，也就是這些人。⁴

在此，布洛克所謂的「人」，顯然與卡勒爾所欲表達者相同，都是意指「集體人」（collective-man）而言；至於此一研究取向所引申出的含義乃是與制度史研究法的分道揚鑣。但是，個人在本書中並不欲採取這種涇渭分明的看法，原因是歷史雖具有其連貫性，但整體而宏觀性的觀察並非人人都有能力可以作到的，更何況還可能因為立論基礎不同而造成「一家一言」的狀況。因此做為研究的開端（同時也反映出一定的現實面），先從尋求幾個具「指標性」的歷史人物入手來加以分析，應當是可接受的做法。至於本書在研究這些人物時的基本假設乃是：重視其「象徵性」（symbolic）遠大於其「代表性」（representative）的意味。換句話說，我們所重視的是他們可被用來說明某些歷史關鍵演變的角色地位，而非將他們視為某種人物「典型」（pattern）來加以觀察。

二、歷史的不確定性

在選擇好目標並準備進行分析比較後，我們所遭遇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在汗牛充棟的史料中去作取捨？杜蘭夫婦（Will and Ariel Durant）曾說：

⁴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53), p.19.

我們對過去所知有限，而且多半並不正確，不僅經常為矛盾的證據及有偏見的史家所蒙蔽，也許還為我們的愛國心或宗教信仰所歪曲；因此，大部份的歷史是臆測，小部份是成見。⁵

巴拉克勞（Geoffrey Barraclough）也同樣說過：

我們所讀的歷史，雖說是根據事實，但嚴格地來說並非事實，而是一連串大家所共同接受的議決。⁶

上述都是頗富哲理的話。這些史家所指的概念其實都是史料的「選擇與判斷」問題；事實上，後人確實經常在前人所開闢出的羊腸小徑上前後徘徊，無所適從，其結果便導致許多史學家們重視所謂的「第一手」（the first hand）資料，希望跳過先人們錯誤或誤導的看法，直接由原始資料入手，然後去探究事實的真相。儘管在邏輯上看來這或許又是另一條羊腸小徑，甚或可能讓我們延宕時光並重蹈覆轍，但仍有許多學者樂此不疲且頗有貢獻。簡言之，在研究目標確定後，接下來的辯論便得依賴所搜尋到的證據。正如柯林烏所說的：「歷史研究的本質便在於解釋證據。」⁷但是證據的搜集對他而言也是很重要的：「……記憶不是歷史，因為歷史是某種有組織的或推論性的知識，記憶則根本不是有組織的或推論性的東西。」⁸而他在另一處又說到：「把歷史建築在記憶與權威之上的常識性理論，……必然倒塌瓦解，……因為歷史並不倚賴權威，所以亦不依賴記憶。歷史家能重新發現已被完全遺

⁵ Will and Ariel Durant, *The Lesson of Hi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2), p.1.

⁶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Basil Blackwell & Mott, 1955), p.14.

⁷ R. G. Collingwood, op. cit. P.18.

⁸ Ibid, p.252.

忘的事物，這意味歷史中無一則敘述是自目擊者以降透過不可打破的傳統而為他所接受的。」⁹在此，柯林烏似乎企圖排除記憶性史料的重要性，從而強調歷史學習者所應具備的自律精神。他對此舉出的例子是：儘管指揮官的捷報聲稱已獲致勝利，但具批判精神的史家依舊會問：「若奏捷，為何不趁勝推進？」（在近代中外關係史裡，此類例證可謂屢見不鮮）但是無批判精神者則缺乏此一能力。換言之，他們無法判斷史實的真偽問題。

三、價值中立與分析判斷

在討論如何正確判斷概念時，所謂「價值中立」(value-free)是最常為人所提及的；這個名詞意指研究者在探討分析一個問題時，必須先摒除先入式的主觀性價值判斷，如此方不至於為個人的好惡所矇昧，或因而減低或喪失觀察的客觀性和發現的可靠性¹⁰。就純粹的邏輯性思考而言，這種推論是十分正確的，因為任何個人都無法擺脫情感因素的繫絆，或是先前學習經驗的桎梏；就像布洛克所說的：

即使是反覆檢證也極可能還是純粹直覺式的。……在不知不覺之間，研究者以前的經驗，隱藏在他腦海中的各種確認與懷疑，他的文化傳統，以及所謂常識，都會支配著他的運思方式。¹¹

這種說法相當具有可思考性，而且也應為我們所深切反省。如何在累積如山的故紙堆中與古人的夾纏不清去奮鬥，乃是一大難題，而

⁹ Ibid, p.238.

¹⁰ 參考《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三冊，頁368，「價值祛除」條。

¹¹ Marc Bloch, op. cit. p.55.

尋求去除己身固有成見之方法，則又是一大挑戰；儘管如此，正如霍斯曼（Housman）所言：「正確是一種義務，而不是一種優點。」作為一個學史者，我們應盡己所能，「客觀的」將歷史呈現在大家眼前。而所謂的「客觀」，其意義是約略等同於「價值中立」的；對此，我們可舉卡爾（E. H. Carr）的看法作一闡述：

……當我們稱某一歷史家「客觀」時，所指的有兩件事：第一，我們指他具有一種能力，能夠超越他自己在社會和歷史裡所占地位的有限視線。……第二，我們指他能夠將自己的視線投射到未來，俾能夠對過去有更深且更持久的洞察，……¹²

這種深長的思想境界儘管是令人難以望其項背的，但其基本想法我們則應把持於胸。在此，本書的寫作概念也隨著前述三個觀點（人物中心、歷史的不確定性以及價值中立）的釐清而開展出來；亦即我們將試圖以某位人物作為觀察整段歷史長流的象徵指標，在透過批判性的觀點來整理史料後，最後再以客觀而中立的角度導出結論。

由於中國近代的對外關係史一直是個人相當感興趣的題目，經過長期觀察與思慮的抽絲剝繭，某種詮釋歷史的基本架構也逐漸在心中緩慢成形而沉澱下來。在本書中，我們企圖以李鴻章作為中心的象徵人物，設法去解釋此一架構的運作，至於整體觀念的進一步推衍及闡述，則將在下面兩節以及後續的正文中作詳細的說明。

第二節 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若干考察

十九世紀的世界對於以歐洲為中心的西方而言，可說是個偉大的

¹² Edward 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p.107.

時代；但是對中國人來說，卻不啻是段悲慘命運的開端；透過掌握海權而進行擴張的歐洲列國此刻正以「維多利亞式的世界觀」（the Victorian view of the World）橫掃全球，並以「條約」為基礎來塑造其權力架構。1840 年代，這道歷史洪流以萬鈞之勢衝向東亞大陸，於是中國也面臨了其命運的關鍵點。與以往的經驗相較起來，中國歷史上因為改朝換代所引起的動盪，只不過是上層結構的權力交接轉換而已，但現在所遭遇的卻可能是整個體系的徹底抽換。對於其間一連串崩解與調適的過程，有人便以「近代化」稱之。由於其過程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同時也包括了中國之國際觀與涉外決策的重整與調適，因而本節首先便將依循此思考脈絡，建立起一套時代架構。

一、近代化觀念導引

郭廷以在〈中國近代化的延誤〉一文中曾經提到：

任何國家民族的歷史，均可以說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歷史。競爭過程的順逆和結果的成敗，決定這個國家的禍福命運。順逆成敗，則又取決之於近代化的程度。¹³

從這段話中，我們當可看出所謂近代化的「競爭性」特徵；但該文未指出其確切的定義，也是個遺憾。不過郭廷以教授在另一篇〈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的文章中又進一步加以若干補充：

我個人認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甚至個人，為使其生活方式，包括精神的與物質的，能適應時代環境，以增進其福利所作的努力與

¹³ 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台北：聯經圖書公司，民國 76 年），頁 3。

所獲的成果，即為近代化。¹⁴

在此，他所強調的則是近代化的另一個「適應性」特徵。而所謂的「競爭性」與「適應性」，乃是基於「整體歷史觀」所作的推衍，正如郭先生自己所說的：「歷史是整個的，在時間上如此，在空間上也一樣。」¹⁵確有其道理。此一史觀的好處是突破歷史框架，直接由概念下手並賦與普遍性定義，以期形成「通則」(generalization)。但壞處則是缺乏時代內涵，亦即其競爭的對象究竟是什麼呢？相對之下，范書義帶來另外一種看法：

所謂近代化就是使社會擺脫中世紀封建形態而資本主義化。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和思想等方面的變革。……近代化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其核心是經濟近代化。……至於政治近代化則是經濟近代化的反映與保證。¹⁶

換言之，這是一種具十八及十九世紀歐洲文化特色的全球化擴散歷程。隨著新航路發現與造船技術的大幅精進，以及一股基於擴張野心的內在心理驅動力，於是使歐洲人以世紀領導者的姿態，帶著「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時代使命往前邁進；於此同時，他們也將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思考模式以及社會政治制度，藉著無堅不摧的武力和無孔不入的傳教士傳播到世界各地。若我們從某個「宿命」的角度視之，這或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反觀當時的中國，她雖曾經在東亞地區的歷史上扮演過輝煌的角色，但是與此刻歐洲的活躍興盛姿態比較起來，不免沈寂許多。其原因可能是：

¹⁴ 同前書，頁93。

¹⁵ 同前書，頁4。

¹⁶ 范書義，〈中國近代化歷程述略〉，《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頁1-16。

……（中國）在經濟上自以為無求於人，……因而無論生活方式或生活需要，並未感到有何變通的必要。…再者，即令有人為了求知慾，好奇心或進步觀念所驅使，有志於域外之學，事實既不許可，亦絕少可能。……他們完全被關閉了。¹⁷

在西力東漸的沉重壓力中，這種關於中國客觀環境外在限制的描述可說是十分貼切而符合現實的，它讓我們瞭解到隔絕性的地理環境對中國所造成的重大影響。不過，若由社會本身的內在制約來觀察此問題的話，或許也頗富啓發效果；例如在《劍橋中國史：晚清篇》的導論中，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便曾提到：

中國的「成熟」將被其穩定性及維持一個長久不變國家之能力所證實，如同生理學上的壅滯（homestasis）。換句話說，累積下的既得利益龐大到無法作任何的變革。¹⁸

若是將歐洲文明的發展過程作一類比，我們似乎並找不到所謂的「類似壅滯」狀態，但他們卻仍具有一定的文化成熟度，故此種說法實在尚有考量的餘地。但是大體言之，它還是與現實情形有若合符節之處，同時也正是中國進行近代化的最大阻力所在。

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國，是一個由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業人口所組成的「低度流動性」社會，位居中央的簡單官僚體系以擁有武力和考試制度的壟斷權而控制了龐大的帝國；這種以「文化」導向所形成的內聚力，乃是史家們深感興趣的焦點之一。長期以來，知識份子也藉著由考試所促進的社會流動，凝聚成一個特殊的團體：他們是孕育於黃

¹⁷ 郭廷以，前引書，頁 9-10。

¹⁸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Vol.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p.3.